



我们的奋斗

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

[美] 房龙 著 李阳 译



我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做到不要嘲笑人类的行为，
不要悲叹它们，
不要憎恶它们，
而只是理解它们。

——斯宾诺莎，《政治论》第一章第四节

房龙小引

1987年，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赵博士如何看房龙？他的大作《宽容》，在国内很畅销呢。”当时我回国不久，乍一听说“房龙”，不由得两眼发黑，只好如实回答说：“我不熟悉房龙，也没读过《宽容》。”

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那么，这个房龙由何而来？

据查，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不是美国土生子。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自幼家境富裕，兴趣广泛，尤其喜好历史地理。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入读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不久俄国爆发革命。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走多年，未能当上名记者，房龙于是转求其次：他先是摘取慕尼

黑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

1915至1922年，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安提克学院，两度教授欧洲史。校方评语是：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可他“缺少科学性，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这话听着委婉，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

教书不成，那就写书做研究吧？房龙的第一部著作，出自他的博士论文，名曰《荷兰共和国的灭亡》（1913）。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可它销路不好，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请注意：此时房龙已育有二子。他必须发奋工作、努力挣钱，才能维持小康水准。

1920年房龙再婚，随即与书商签约，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古人类》。这本杂书旗开得胜，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自1921到1925年，他接连发表《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等多部畅销书。

短短十年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进而自由写作、四处旅游、参与多种社会活动。至1944年去世，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

我们已知：房龙并非资深学者，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谁想这个不入流的房龙，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依我拙见，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牵扯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其兴衰过程，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

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1922年，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人类的故事》。192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译者是沈性仁女士。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

房龙 1920 年发表的《古人类》，也于 1927 至 1933 年间，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书名分别是《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文明的开端》等。其中，林徽音译本《古代的人》，颇受中国学界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1927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林译本序言中，郁达夫发表高见道：房龙文笔生动，擅长讲故事。“他的这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他又道：房龙魔力，并非独创。说到底，此人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大赚其钱，沽名钓誉，委实令人侧目。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偏又跟着推波助澜，鼓吹房龙作品。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气不过，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当面呵斥房龙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啥？你也算是作家吗？”

房龙死后，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称他“善于将历史通俗化，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房龙的儿子，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美国文学史、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地理和艺术。”

对比美国人评语，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而且老道。唯有一点遗憾：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上述“挥笔成金”的神奇法则，后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进而著述论说，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曰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何谓文化工业？说白了，即出版商、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套

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大批策划、炮制、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此意义上，房龙的商业成功，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再看三十年代国际政治。房龙的盖世大作《宽容》，初版于1925年。此际，欧洲革命刚刚退潮，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最不宽容的时代”。为此，他欲以“宽容”为话题，带领读者回到古代，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不宽容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

一句话，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始终贯穿着“宽容与专横”的搏斗：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它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提醒大家：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即相信科学理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它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

“进入20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铁链、火刑柱。”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房龙嗤之以鼻道：“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还需要一万年、甚至十万年。也就是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

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次年，房龙推出一本《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1939年，德国入侵荷兰，大举轰炸鹿特丹。房龙怒不可遏，遂以志愿者身份，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二战期间，他代号“汉克大叔”，日夜报道欧洲战况，鼓励家乡民众，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

1940年《宽容》再版，房龙写下后记《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为啥不幸福？只因“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与偏执”。非但如此，“最近六年来，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结论：“宽容并非一味纵容。如今我们提倡宽容，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

《宽容》为何在中国受欢迎？窃以为：起因在于反法西斯，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废墟中，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又为《圣经的故事》出版了中译本。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

这封信中，房龙自称他“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他又提醒译者：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宽容”的部分，因为“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遥望德国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房龙自问“我能做到吗？”，后面连加五个问号。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房龙《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

房龙死后四十年，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是何道理？据沈昌文回忆：“翻译出版此书，得益于李慎之。李先生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他曾跟我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按照指点，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宽容》。”沈公又说：“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所以《宽容》出版后，一下子印了15万册。”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三联不再重印《宽容》。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根据沈公收藏目录，其中便有广西师大中英双语本、陕西师大全彩珍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12个不同版本。1999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14册的《房龙文集》，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

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誉其为“自由主义代表”、“人文主义大师”、“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云云。对此，我要插一句闲话：房龙不入流，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偏偏这个房龙，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都是书，差别为啥这么大呢？对此，王国维先生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早已指点过我们：“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先生古板。他老人家不懂得：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岂不皆大欢喜、人人捧读？因此便有文化热、房龙热，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

如今中国人都读书、都买书。其中最好卖的书，就是闲书、杂书、可爱书、读了不痛苦的书。

比较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即便同九十年代比，眼下也是过之不及、量之有余。经此一想，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三联要出房龙文集？可以呀，我很乐意为其写序！

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百家口味、各个不同。所以能否宽容，能否兼收并蓄，事关历史能否进步。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

他又在《宽容》后记中告诫说：“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一旦我们麻痹大意，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赵一凡

2008年10月于北京

引 言

昨天，在一次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印度群岛的发现者）的大会上，我们西方民主国家最大城市市长的名字遭遇了嘘声，而一个外国独裁者的名字却得到了喧嚷的欢呼。

今天早上我去了纽约。我本以为会看到这座城市群情鼎沸，义愤填膺。我本以为会看到警戒会会员们在街上巡逻。我本以为会看到所有善良和忠诚的市民聚集在国旗之下，因为纽约市长遭嘘而一个外国独裁者的名字受到狂热欢呼这一事件玷污了国旗。最最不济的，我本以为会看到所有的报纸都发表社论，理直气壮地声明，纽约市民正当选出的行政长官的名字遭遇嘘声，而一个外国独裁者（并且曾公然宣称是所有民主政体的死敌）的名字受到热烈的同声欢呼，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本以为会听到我们国家的政府宣布，将立刻把那些应对这一丑行负责的伪公民送上轮船，免费送往他们尽管曾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然而却在感情上效忠的那个国家去。

然而我看到了什么？

全然的冷漠！彻底而卑鄙的冷漠！至多，是一种稍稍有些俏皮的态度，打算对整个事件一笑置之，视其为一个不得体的笑话。有人说：“噢，小花^①有幽默感，他受得了。”还有人不无得意地耸耸肩，信口评论道：“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另有一些人辩称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既然我们能够掌控选举，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也有人对那位行政长官怀有私怨，因为他向他们征了比他们期望的更多的税，所以他们非常希望给他点儿颜色看看。然而似乎没有人（只有极少数例外）对此感到震惊，没有人认为这个小小的事件危及了我们国家生存的根基，没有人认为这应当是令我们对合众国前途忧心忡忡的衰亡的征兆。因为当今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中最大城市正当选出的地方长官的名字遭到了侮辱，而一个外国独裁者和所有民主政体的死敌的名字却受到了热烈的致敬，并且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整个事件都被视为一场荒唐但却无足轻重的闹剧，将会无声无息地被迅速忘却，因为“到底有谁在乎呢”？

这就是我要写这本小书的原因。

到底有谁在乎呢？

是的，我在乎！

如果一个国家对它自己的命运丧失了兴趣，那它就气数将尽了。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气数将尽，因为那样的话，将这个世界建设成一个真正美好、合乎人道的社会的最后一线希望就将从地球表面消亡。那样的话，人生也就不值得再留恋了。然而，我不仅想

^① 指当时的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菲奥雷洛”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小花”。——译注

活着，还想活得足够长，以便看到托马斯·杰斐逊及我们伟大的自治实验的其他开创者所树立的原则最终大获全胜的那一天，看到不可一世的专制独裁政体灰飞烟灭的那一天。现在，独裁统治已将其坦克炮塔傲慢地伸向了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企图毁灭我们。因为我们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那些关于普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想硕果仅存的最后堡垒，所以他们惧怕我们，厌恶我们，憎恨我们。

在1938年，这个令我们蒙羞受辱的一年的10月12日，一群暴徒在纽约向他们自己的市长发出了嘘声，却向一个外国独裁者的名字发出了欢呼。因此在同一年的10月14日，我开始写这本小书。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尼治

目 录

房龙小引	1
引 言	1
我们的奋斗	1
关于作者	104

我们的奋斗

我将向阿道夫·希特勒发出我唯一愿意给予他的赞扬。我承认在我们的敌人中，他无疑是最危险的一个，因为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的人之一。

纳粹宣传已经全面地席卷了我们的社会，以致立刻就会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单单挑出希特勒？为什么不斥责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对于日本和土耳其又该怎么说？”

因为，尽管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绝对不比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好，却还不足以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不像那位已故奥匈帝国海关第十一级助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的儿子，作为第三帝国的元首，他能够将他的意志强加给整个欧洲，并且假如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存在的话，也能对其余的世界做同样的事情。

在我开始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时，请让我先给自己一些警告。我绝不能允许自己陷入通常的诱惑中，把这位德国独裁者作为某种令人痛苦的笑话看待。至少在此方面我们最好循他之例，像他自己

看重自己一样对他予以相当的重视。

其次，如果我让人们怀疑我对他有极大的私愤，我的目的也将无法达到。我的确对他怀有私愤。他谋杀了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而且是冷酷、蓄意的谋杀。但我的职业是历史学家，而不幸的是，历史学家是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像受任制止某种流行病的医生。那些可怜的大夫也许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一些自己最心爱的亲人悲惨地死于这种疾病，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都绝对不能有所偏心。在对待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者断命的细菌、虱子和蚊子时，他们必须完全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便是试验和定位这些罪魁祸首，研究它们，直到提出能够消灭这些祸害的办法和途径。

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医生在着手研究问题时，必须保持一种完全客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始终明白，如果人类社会本身没有以某种方式严重地违背某些基本的正常的生存法则，并且因长期的冷漠和忽视给这些现已危及其生存的敌人以迅速滋长的肥沃土壤，他们受任制止的这场可怕的灾难将根本不会发生。 •

对于医学界人士来说，所有的细菌都是一样的。它们都只不过是作为我们这个宇宙的基础的“生存意志”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历史学家也应当以一种完全客观的精神，接受那些时而侵袭我们的社会体系，从而造成比一打瘟疫或黄热病爆发还要严重的死亡和破坏的恼人的细菌。他应当将这样的细菌放到常识的显微镜下，借助他以往的经验直觉来研究它们。然后适当地给它们分类并予以描述，直到所有外行人都能辨认它们。他应当尽其所能地告诉社会未来如何防止这种最危险的瘟疫再度爆发。

因此，我应当对于造成了“剧毒性专制”新近爆发的环境，以

及造成了我们当前苦痛的“病毒”本身，给予同样的重视。

以许多医生在新病人走进诊室时所采取的那种随和态度，我不假思索地倾向于这样说，我也许要得出在我以往长期的研究中每当涉及专制话题时所得出的同样的结论。始终如一的是，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制总是糟糕的民主的结果。

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因为这是我们当今一切麻烦的起点。专制总是糟糕的民主的结果，正如伤寒、霍乱和天花总是糟糕的身体条件和环境条件的结果一样。

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许不合我们的口味，我们甚至也许厌恶和憎恨他们。但请记住，他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也负有责任。因此，也应该由我们来将他们铲除。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儿子恰好从佛蒙特来看我。他把卡车停好后（他似乎更喜欢用卡车做交通工具），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想警告我们的人民警惕希特勒，你看。”我把手稿递给了他。

他仔细地读过，很少有儿子这样读父亲的文学作品，读毕他把手稿还给了我。

“写得不错，爸爸，”他说，“当然，您的工作就是长篇大论、慷慨陈词。但我倒想了个主意，您把这些意思缩成一段，这样就能让所有的美国主妇明白了。只需告诉她们，如果不注意清理厨房水槽的下面，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看到黑色的大甲虫四处乱窜，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消灭甲虫了。”

我欣喜地认为这段话证明了我长期的一个信念，那就是至少就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而言，这个世界的确是在变化。

所有曾向医生倾诉衷肠的人都知道，高明的医生在号过我们的